

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 ——以三亚回族为例

孙九霞^{1, 2}, 陈 浩^{1, 2}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2.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 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目的地, 但是在这种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 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族群文化中的某些方面会被格外强调, 从而影响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本文选择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 即海南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 采用观察法、访谈法、文献法等定性研究方法, 通过对案例地社区旅游发展前后的对比研究, 发现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旅游相关行业使当地居民的族群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 主要体现在宗教意识得以强化、传统习俗发生改变、旅游与传统产业的职业认同有所分化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 目的地社区; 族群认同; 三亚; 回族

文章编号: 1000-0585(2012)04-0758-11

1 引言

作为一种族际交流方式, 旅游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游客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和人群中去观光和体验, 这其中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在这种交流和接触的背后, 又代表着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 毫无疑问, 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碰撞会对接触双方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客两边都会发现彼此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种种不同, 尤其是当双方来自于两个文化类型迥异的族群时, 这种差异会更敏锐地被感觉到, 从而产生对自身族群的再认同问题。而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 某一旅游目的地被外来游客大规模的造访成为常态之后, 由于目的地社区居民长期处于与外来族群频繁而密切的互动中, 相对地, 游客则是来自五湖四海, 地位身份各异, 且一般而言在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较短, 旅游活动结束后又会回到原先熟悉的环境。相比之下, 目的地居民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游客来得持久而剧烈^[1]。因而, 对于目的地社区居民的研究也就成为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他们的族群认同会在旅游接触中发生怎样的变化? 不同类型的旅游社区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这些都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此外,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手段, 旅游开发还会使得许多原本处于落后和封闭状态的社区及其居民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经济社会的发展, 收入水平的提升, 是会导致当地居民被全球化、标准化的生活方式所统一, 从而丧失了自身的

收稿日期: 2011-05-15; 修订日期: 2011-12-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41171124); 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40000-3161103)

作者简介: 孙九霞 (1969-), 女, 山东潍坊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人类学、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研究。E-mail: sjxia@21cn.com

族群认同？还是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使其依旧保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遗产？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为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目标。

关于旅游对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影响，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学理上的探讨。Van den Berghe 等^[2]将族群特色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划分出三类角色：游客（Tourist），当地人（Touree）和旅游经纪人（Middleman）。游客对当地人的观赏一方面使得当地居民想脱离这种在别人观察下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得保留一定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以吸引游客。而旅游经纪人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营利性非官方组织，一类是政府。营利性非官方组织对当地族群文化的推介能促进族群认同的加强，而政府出于鼓励或抑制当地社区族群意识发展的目的，或可能鼓励或可能抑制当地旅游的发展。MacCannell^[3]认为大众旅游重构了族群认同，一方面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带来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当地文化的发展又因为游客的需要而终止，即所谓的“博物馆化（museumized）”。同时，主流社会一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由敌视转为欣赏，另一方面只在少数民族将其自身限制在主流社会认定的他们的“形象”中方才接纳他们。Hitchcock^[4]从情境论的角度（Situational Perspective）出发，认为旅游促进了新生国家中认同形成的进程以及鼓励多数族群重新评估他们对少数民族的看法。

除了学理探讨，国外学者的几个经典的案例研究尤为深入。Adams^[5]在对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托六甲人（Toraja）的研究中发现，为迎合西方游客的需要，当地人将一些在本地已较为罕见的文化元素如传统的船形屋、水牛祭礼等作为旅游吸引物保留下来，但其本身的族群认同已被抛弃；Esman^[6]在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 Cajun 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原本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法裔 Cajun 人，受到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法语地区游客对 Cajun 文化强烈兴趣的影响，重又建立了自身对本地文化和族群的认同；Pitchford^[7]在对威尔士旅游业的研究中发现，受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要求地方自治的政治运动的双重作用，普通威尔士民众的族群认同意识得到了重新建构和加强。

国内关于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最初始于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旅游开发初期，学者们更多关注旅游对民族、对社区的消极影响，积极倡导民族传统文化保护^[8,9]。但在旅游对族群认同的作用方面则乐观得多。有学者认为因开发“民族旅游”而派生出来的“旅游民族”现象是多向、多因的互动过程，既有政府为发展、加速增长、解决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考虑，也有被“开发”的少数民族借此突出并推进自身地位及价值的历史、文化意图^[10]，后者揭示了族群对旅游开发的积极认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旅游强化了族群认同，至于原因则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中的社区参与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社区居民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本族群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11]。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需要通过宣传自身特有的文化要素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旅游形式，“民族旅游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而且为族群文化的复制、再造和再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场景和舞台”^[12]，“民族旅游是实现族群认同和文化要素复兴的重要手段，可以实现族群的精神重建”^[13]。

综合来看，当前国内外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目的地社区（即中国大多数学者所谓的“民族旅游”）。研究的结论则多倾向于认为旅游发展、游客对目的地社区当地文化的热衷提升了目的地社区的族群认同，或

者说保存了某些在当地即将消失的文化形式。

虽然中外学者就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之前的研究往往将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视作不分场域、不分对象、不分类型的普遍现象,而忽略了对旅游影响进行不同强度、不同参与程度的细致区分,没有考虑到旅游地的类型和主客交往的程度,也没有看到目的地社区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因此,在对目的地社区进行研究时,要首先考虑案例地的自身特点和旅游参与类型,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采取合适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地识别出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而在对此前国内外的旅游影响研究案例地类型进行归类之后发现,此前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以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目的地社区。在这一旅游类型中,社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受到旅游业影响的,其中即便有居民未直接参与旅游业,但由于其族群文化中的若干要素出于吸引旅游者的考虑而被反复宣传和强化,因此,作为族群中一分子,社区居民的认同意识多少会受这些宣传的左右。而在一个非族群文化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目的地(如海滨度假地)则基本就不存在这类宣传,旅游只是单纯地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并不会对族群原有文化进行刻意引导,而且族群成员多以个人身份参与旅游业。该类社区的同一族群中存在着参与旅游业和不参与旅游业的居民之间的区别,通过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就能更好地识别出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就选择了一个不以族群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社区,即海南三亚回族社区来作为案例地。

笔者于2008年7月和2009年3月两次进入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历经二十余天,访谈四十多位各族民众,行业分布包括旅游相关产业、普通村民以及村委会干部、清真寺工作人员等,通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深度访谈(主要研究方法,了解被访谈对象主观意识上的族群认同情况)、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宏观情况,如回族参与宗教活动等)、文献法(利用统计数据来了解当地社区的概况和旅游发展状况以及通过历史资料来了解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前的情况)等研究方法,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收集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2 三亚回族社区的旅游参与

2.1 三亚回族社区概况

三亚的回族主要分布在凤凰镇的回辉和回新两个居民委员会^①,这两个回族社区也是整个海南省仅有的回族聚居区。三亚位于三亚市的西南部,毗邻著名的旅游区“天涯海角”(图1),距市中心和凤凰国际机场都不到10 km。国道公路经过凤凰镇,县道公路(即凤凰路)从回辉和回新两



图1 三亚凤凰镇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of Fenghuang Town in Sanya

^①虽然已由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但当地居民都习惯以回辉村和回新村称呼之。

村穿过。回辉村现有人口 3470 人, 08 年人均收入 7540 元; 回新村现有人口 3287 人, 08 年人均收入 6682 元。两村居民的收入在凤凰镇各村中居于最高水平, 在三亚市也名列前茅。

三亚的回族先民主要有三个来源: 最早的定居者是唐宋时期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蕃客^[14], 主体部分则是宋元两代从越南占城入居的穆斯林, 另外就是随后融入的大陆回族^[15]。

2.2 三亚回族社区的旅游参与

传统上, 当地回族是以捕鱼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由于收入有限, 当地回族的生活一直处于困顿之中。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三亚旅游大开发, 正好给两个村的回族提供了一个发挥经商才能、提高整个族群成员生活水平的契机。当地政府也不失时机的提出, 要利用回族善于经商的特点来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16]。回辉村和回新村优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也方便了三亚回族开展一系列旅游经营活动。目前, 回族从事的与旅游相关的行业主要有如下几类:

2.2.1 旅游商品销售业 作为一座具有热带风情的滨海旅游城市, 独具海南特色的岛服在来三亚的游客中可谓相当受欢迎。而做工优良的水晶、珍珠以及其他旅游工艺品(如海螺、红珊瑚等)在市场上也销路甚广。因此, 颇具商业头脑的三亚回族就看准商机, 纷纷投身到旅游商品销售这一行业中。据回辉村的居委会蒲主任介绍, 三亚回族从 1990 年起就开始做工艺品生意。目前在三亚回族中,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是最多的。回新村 1200 个劳动力中, 就有 500 人左右在各个景点或者凤凰路的旅游工艺品店里从事经营活动, 且基本都是妇女。据笔者 2009 年 3 月的观察, 在回辉村的凤凰路沿线就分布有 14 家旅游工艺品批发零售店, 在回新村凤凰路沿线也有两家。

除了固定的批发和零售点, 还有众多的妇女到各大旅游点直接向游客兜售珍珠项链等。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参与这一活动, 收入相当可观。据笔者 2008 年 7 月调查统计来看, 在天涯海角景区内、在大东海景区广场、在亚龙湾的海底世界, 都有数十位回族妇女在从事经营活动。

关于这些旅游工艺品摊点的收入, 一位回新居委会的干部认为: “旺季挣得多, 淡季挣得少, 旺季一个月有 1—2 万, 自己做老板的, 能挣到 4—5 万。”

2.2.2 旅游运输业 如果说, 旅游工艺品行业是由回族妇女占主导的话, 那么旅游运输业就是回族男人的天下。2009 年, 两村回族共有各类车辆 600 多辆, 包括中巴车、面包车、小轿车等。上世纪 90 年代初, 三亚的旅游业刚刚起步之时, 回族的运输工具还是以三轮摩托车为主, 主要搭载游客从三亚市区前往各个旅游区。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所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也逐步实现了升级换代。1994 年 7 月三亚市凤凰国际机场启用后, 他们已经开始大量购进各类小轿车, 并基本垄断了凤凰机场通往市区的客运生意。1998 年南山寺建成、南海观音开光之后, 回族又开起了中巴车, 经营从市内鸿港市场途经天涯海角、西岛一直到南山寺的中巴线路, 并占到了这条线路上车辆总数 90% 的份额。

到了 1999 年, 为方便统一管理, 两个居委会成立了一家三亚新辉汽车管理有限公司, 帮助车主办理各项业务。目前共有 53 辆中巴车挂靠在这个公司, 车主每月上交 200—300 元即可, 车的所有权还归车主个人。而在凤凰机场的 400—500 辆回族的出租车也成立了一个车队, 以避免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2.2.3 旅游餐饮业 如果说那些从事旅游运输业的回族还处在财富积累阶段的话, 那么, 部分开办宾馆和饭店的回族就属于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了。而以目前的数字来看, 在

此行业中的富裕阶层的数量已经较多。截至笔者 09 年 3 月第二次调研为止,在回辉村的凤凰路沿线,共有五家宾馆;而在回新村的凤凰路沿线则有 9 家饭店,其中 8 家主打的都是这里有名的回族鲜鱼汤。

问及常来光顾的消费人群的构成时,回新村喜来饭店的老板李女士告诉笔者:“这里是靠本地客人多一点。我们这边很少拉游客过来消费,偶尔有,也是靠本地的朋友带过来吃饭。”对此,回民清真老饭店的老板海女士也证实:“大陆和海南的口味有点不太一样,海南人喜欢吃酸酸的,有点像杨桃那种口味的菜品,因此,到这里来吃的还是海南本地的居多”。当问到这些饭店的开业时间时,海女士说:“这店开了已经有 10 多年了,是这里最老的回民鱼汤店,我们这家店开了之后,其他店才陆续开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做各行各业的都有了,像开这种饭店的就有 7、8 家,都是回族自己开的,不过不是连锁的。”

3 旅游参与背景下社区居民的族群认同

回族作为一个穆斯林族群,伊斯兰教在其族群认同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17]。研究其族群认同的变化,关键是要看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否在旅游参与背景下有所淡化。因此,在本研究中,结合回族族群认同的特点和当地社区的现实状况,对族群认同的考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宗教信仰,包括清真寺、民居建筑风格的变化,与穆斯林国家间的交流,阿拉伯语的掌握程度;生活习俗,包括做礼拜的频率、烟酒等禁忌的恪守;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等。

通过参与旅游业,三亚回族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使他们更有能力和意愿来表达自身的宗教信仰;旅游业带来的对外交往增多,也改变了当地以往的一些习俗和观念。不过,由于存在参与机会上的差异,在族群内部形成了参与旅游和不参与旅游的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原本团结的族群在内部归属感和凝聚力上有所改变。

3.1 宗教意识得以强化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族群认同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的回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之所以能够将众多来源不同、语言不通的中亚诸民族整合在一起,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无疑起到了维系族群存续的关键作用^[18]。而作为一个孤悬在海南岛最南端、与大陆回族同胞相隔甚远且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其他民族包围之下的回族社区,宗教信仰的坚定是其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宗教对加强族群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族群的聚合剂。”^[18]因此,要想考察三亚回族的族群认同变化,首先就应该分析在旅游发展前后他们宗教意识的变化。

3.1.1 赴麦加朝觐者逐渐增多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概括于“清真言”中,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使。”具体说,穆斯林信仰包含以下六大要素(即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末日审判。伊斯兰教规定,每个成年的穆斯林,除了具有表现在内心世界的上述六大信仰外,还必须履行表现在行动方面的五大功修,即“认、礼、斋、课、朝”^①,简称“五功”。其中“五功”中的最后一项就是“朝功”,即每个穆斯林如果条件允许,一生中至少要到麦加的克尔白天房朝觐一次。因此,对于三亚回族来说,有生之年,能前往麦加朝觐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是一种应尽

^①念作证词、礼拜、斋月斋戒、缴纳天课、朝觐天房。

的义务。但是，前往麦加朝觐的费用不菲，一位在清真北寺当过六年教长的杨子华先生就告诉笔者，每去一趟所需费用大约是人民币三万元。这对于在旅游发展前仅靠打鱼种菜为生、收入微薄的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因此，1990 年以前，三亚回族中去过麦加的人屈指可数；1990 年之后，个别通过从事旅游先富起来的居民开始能够承担起这个费用，因而每年都有几人去朝圣；到了 2000 年之后，随着回族收入的普遍大幅度增长，三亚回族中想去麦加且有能力承担费用的人数激增。像杨子华先生自己现在就开了一家水晶珠宝店，年收入超过了五六万元，承担一次朝觐的花费绰绰有余。但也正因为居民的收入都提高了，想去的人又多，相对于有限的名额，竞争就显得异常激烈，以至于连曾贵为六大清真寺教长之一的杨先生都没有如愿。“希望今年能去吧，等了这么几年，估计今年差不多了。”杨子华教长这样向笔者透露道。

尽管花费不菲且竞争激烈，但对于那些还没有去过麦加的普通回族居民来说，他们对此还是抱持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去麦加，去那个所有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朝觐。回新村一位经营回民鱼汤店的杨老板就对笔者表示：“以后肯定要去，有能力的话一定去。去麦加需要足够的资金，还有一颗虔诚的心。”当然，不用说，旅游餐饮业经营上的成功给了他这样十足的底气。

3.1.2 社区内民居建筑日渐具有阿拉伯风格 大量人员赴麦加朝觐及海外留学给当地社区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居民住宅风格的转变。三亚回族的住宅是这两个回族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富丽堂皇且美观雅致，既展示着这里回族人的富裕，又渗透着浓郁的阿拉伯风情。不过以前的回族住宅并不是这样。过去的回民住宅基本是徽派风格为主，从现在仅剩的少数几户未改建的民居看，都是黑瓦白墙，每条瓦脊都高高堆起，前后左右均不留瓦沿，两扇稍凸出小码垛，瓦沿下白墙画有黑线图案，虽经多年风雨侵蚀但仍黑白分明，墙角披层多挂满藤蔓，透着古典中国的文化气息。如今，通过旅游致富的回族纷纷把旧有平房改建成新式楼房，建筑风格也从传统中国式转变成东西合璧式。这些新建的楼房从色调看有金黄色的，有淡黄色的，有深蓝色的，也有浅蓝色的，还有绿白相间的。从结构上看有空塔尖顶，有



图 2 当地回族住宅

Fig. 2 Local dwelling house of Hui ethnic group



图 3 当地汉族住宅

Fig. 3 Local dwelling house of Han ethnic group

古堡圆顶,有支架型结构顶,非常美观,其屋檐都用琉璃瓦装饰,外墙多用马赛克或彩瓷,也有的用仿古瓷。门、窗都明显带有阿拉伯风格。(回汉建筑风格对比见图2,图3)

据回新村喜来饭店的老板李女士介绍,建筑风格的转变是由于两个村的回族在中东国家留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那里不仅仅学习宗教理论,也受到了各种中东建筑风格的熏陶。回国之后,他们就照着那种风格改建自家住宅,其他村民也有样学样,像她们家的楼房也造成了阿拉伯风格。

除了建筑风格的改变,每户回族居民家门头还都饰有阿拉伯文横匾,多为“平安”或“真主独一”之意,或者直接写有中文的“主恩常念”、“认主独一”等显示他们虔诚信仰的文字。

3.1.3 清真寺得到良好维护并承担文化教育功能 作为回族社区宗教生活的核心,清真寺的改扩建工程也受到了富裕起来的回族居民的重视。他们把重建清真寺视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头等大事摆上议事日程,各个家庭踊跃捐款,并争取到了部分海内外穆斯林团体的赞助,先后扩建、新建了回辉村的清真古寺(1987年)、清真西寺(1997年)、清真北寺(1993年)、清真东寺(1995年);回新村的南开清真寺(1990年)、清真南寺(1995年)。

与民居风格的变迁相对应、伊斯兰化相对应,扩建和新建后的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也开始转变。据德国人史图博1931年在《海南岛民族志》中的记载^[15],以前的清真寺,全部都是汉式风格的建筑物。而现在的清真寺,除了主体礼拜大殿建于建国前的清真西寺是中国宫殿式风格外,其余几座无论是改建的还是新建的,其礼拜大殿和一些附属建筑均呈现阿拉伯风格,或是拱北造型,或是尖顶结构。

为使回族传统文化代代发扬下去,三亚回族还坚持向年青一代普及宗教文化知识,在各个清真寺开办经堂教育,利用空闲时间,向青少年讲授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和教规礼仪。近年来,为了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方便广大群众更好的学习古兰经并更方便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进行交流,三亚回族在当地开办了三座阿拉伯语学校,分别设在清真北寺、清真南寺和南开清真寺。招收的学生不光有本地回族,还有其他省份来的穆斯林。任教的老师全部是留学归来的,按照正规学校的课时安排进行授课。对于工作繁忙的人士,则设有回族夜校;对于中小学生,则有暑期学校。总而言之,只要想学,三亚的回族都能在本社区内获得良好的宗教教育及语言教育。

关于三亚回族对宗教的虔诚,回新村一位居委会干部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性阐述:“我们这里可是很虔诚的。我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是一定的,没有怀疑的那种。”见多识广、曾游历国内各穆斯林聚居区的杨子华教长也认为:“跟内地的回族相比,这里的伊斯兰教氛围更浓一点。”甚至对于三亚回族的虔诚信仰,外来的不少回族也表示了他们的敬意。一位来自西北甘肃回族区、在此经营拉面馆的马先生就说:“这里回族的精神状态很好,比我们那里都要好。”可见旅游致富并没有影响到三亚回族的虔诚信仰和对自身族群的认同,相反地,由于手头宽裕了,他们能够通过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3.2 传统习俗发生改变

3.2.1 妇女地位提升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回族妇女是不应该出来抛头露面的。在三亚回族传统社会里,对于妇女的性别角色的区分很严格。在社会上,妇女的交际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未经许可,不能与男子和其他人接触。这种限制,在女性未出嫁前主要由父母执

行, 出嫁后则改由丈夫实行。可以说, 在社会工作活动场所, 是没有妇女的身影的, 社会生产活动大多由男子进行。回族妇女多局限在家庭事务中, 负责生育抚养小孩、做饭、种菜、打理事务等事项。参加集体宗教活动, 基本上没有妇女的份, 念经、做礼拜都是在家里做, 不能到清真寺做。

妇女参与旅游业, 尤其是旅游商品销售这一行业, 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社会分工的传统。由于经营活动的需要, 许多回族妇女每天天没亮就离开家, 到各市场各旅游景点做生意, 直到傍晚才回来。家庭中的各项家务事项交由有空余时间的老人、丈夫、年龄稍大的孩子处理。若家中没老人或其他人没空做这些事, 则请保姆来完成。而随着妇女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 家庭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妇女, 妇女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也相应增加。对此变化, 回族男性也予以认可。回新村的蒲先生坦然地说: “现在家里主要依靠老婆, 她提个篮子出去卖工艺品, 临出门给我 20 元钱, 交待我买菜、煮饭。这很正常”^[19]。

3.2.2 能婚习俗有所变化 三亚回族历史上的婚俗特点有三: 择偶上父母的意见起着决定性作用; 婚礼按照伊斯兰教仪式举行, 由阿訇主持与证婚; 严禁跟其他民族通婚: “不与民为婚, 人亦无与婚”。德国人史图博在《海南岛民族志》也佐证到“这些伊斯兰教徒, 当然是不与其他宗教的汉族妇女通婚的”^[15]。

如今, 不与异族通婚这一点已经有所改变。对方无论男女, 只要信仰伊斯兰教, 结婚时按照教义进行洗礼, 取个教名, 婚后遵守该教各项习俗和教规, 按时参拜即可。对此, 村民也表示可以接受。目前, 两个村都有与外族通婚的案例, 加起来共有近五十例, 以在做生意时认识的为多, 对方既有三亚本地的, 也有外地的。笔者访谈的一位大妈就表示: “我有个大女儿嫁给山东的汉族了, 我和我丈夫也没有干涉, 随便她了, 但是女婿入了教。他们对我很孝顺, 也经常来看我。”

3.2.3 做礼拜的频率有所下降 旅游参与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做礼拜频率的减少。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 穆斯林每天需要五次礼拜, 分别是“晨礼”(天亮后日出前举行)、“晌礼”(午后一时左右举行)、“脯礼”(下午五六时举行)、“昏礼”(日落后举行)、“宵礼”(睡前举行), 每周五还要行“主麻拜”。但是囿于所从事工作性质的限制, 很多妇女需要从早到晚都呆在旅游点做生意, 男人们白天则都在从事运输工作, 因此, 做礼拜的频率比以前大大降低。

据清真北寺的杨子华教长说, 现在每天循规蹈矩按照教义去清真寺做五次礼拜的基本只有老人, 每周五“主麻拜”时人数会多一点, 很多在三亚市内做生意的回族都会赶来村里清真寺做礼拜, 以尽到一个穆斯林的职责。

关于村民做礼拜的频率, 笔者询问了回辉村的李先生。他说: “我们规定是每天做五次, 但很多人很少做五次。五次的也有, 但大部分是老人, 他们没什么事。我们村一向都是这样, 老人和 40 多岁以上的都是五次的。年轻人都是有点懒的, 工作的, 开车的, 都是做不了的。”笔者又问他跟以前相比如何, 他回答: “以前大部分能做到五次的, 90% 以上这样。现在就只有 30% 了, 剩下 70% 也就弄弄样子。”对此, 回辉村蒲先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一个礼拜做两次。实际上应该一天做五次。老人做的比较多, 年轻人都不是。……以前的话, 都比较积极, 现在有工作, 都要到外面去做生意。”可见, 尽管回族居民主观上宗教意识较强, 但客观上由于时间原因而礼拜频率仍有所下降。

3.3 职业认同出现分化

因为旅游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村民广泛从事非农产业。村民大多认为生活水平普

遍提高,在外人眼里已然步入小康。一位跑出租车的先生就这样告诉笔者:“这里村民的收入早已小康水平。”年入数万的杨教长也认为“村里人的经济状况不错,连修的房子一般都有二、三十万。”

尽管从事旅游经营使得许多回族摆脱了原有的一穷二白的状态,步入了小康甚至富裕阶层。但对于部分仍在从事传统职业的村民,比如捕鱼、种菜者而言,生活并不是那么乐观。甚至由于旅游开发的缘故,不少原本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的土地被征用,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来源,几近沦为无业状态。由于发展海滩度假旅游的需要,渔民的作业范围也受到很大限制。回辉村一位打鱼的蒲师傅诉苦道:“我们一直在海边抓鱼。以前打鱼打得多,现在因为大船很多,所以一天只有几十斤,只能卖到一两百块钱,生活很艰难了,以前一天有一两万斤。……我们抓鱼都三百年了,现在宾馆开发旅游业,把海都围起来了,鱼都不好打了。”传统渔业面临困境,渔民的职业认同也明显弱化。

总体而言,旅游发展推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多元的就业渠道。但不同职业的居民对于自身的职业认同产生了分化,阶层意识开始萌生。

4 结论与讨论

旅游作为一种族际交流的方式,它对族群认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关注,尤其是作为大众旅游兴起之后被不同族群背景的游客频繁造访的目的地社区,其居民的族群认同变化更是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在一些民族旅游社区,由于是以其特有的族群文化来作为旅游吸引物,其族群文化中最能体现其族群特点的部分(如某些宗教仪式、手工艺品、歌舞表演等)被变作旅游商品向游客出售^[2],为了保证经济利益的更好实现,这些文化形式必然会被不断的强化和宣传,从而唤醒原本已经淡漠或者消逝的族群认同,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类型旅游目的地社区中,旅游起到了强化族群认同的作用。

与其他学者选择的案例地类型不同,本案例地由于是一个海滨度假旅游地,而不是一个“民族旅游”社区,居民从事的职业与那些需要靠“销售”自身族群文化来吸引游客的行业无关(如民俗表演、文化符号展示等),因此,社区居民族群认同变化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旅游参与后收入的增加和旅游发展带来的与外界的频繁接触。

三亚回族社区居民从事的旅游相关职业主要有旅游商品销售、旅游运输业、旅游餐饮业等,社区本身或者说族群本身的特有文化要素并不是旅游吸引物,居民参与旅游的场所也基本上与居住地分离。具体而言,三亚回族中的妇女主要在各景区和凤凰路道路两旁从事旅游工艺品销售,男性主要从事旅游交通运输,一些资金积累较为雄厚的居民则开办有旅游宾馆和饭店。

旅游对不以自己的族群文化为吸引物的三亚回族社区的族群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宗教意识得到强化。通过参与旅游商品销售、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等,居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也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够有机会、有能力表达自身的宗教意识,将自家住宅和清真寺修得更大、更阿拉伯化。

第二,传统文化习俗发生改变。传统的三亚回族社区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社会,严格恪守宗教礼仪,不与外族通婚,妇女社会地位较低。旅游发展带来的与外界接触增多使一

些传统习俗发生了改变，通婚禁忌被打破，旅游参与使妇女地位也得到提升，大部分居民做礼拜的频率则有所下降。

第三，职业认同出现分化。三亚回族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旅游业成为其核心产业，因而从事旅游服务业也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职业选择。但旅游从业者，尤其是从中获取丰厚利润的居民，他们对于所从事职业产生高度认同，对于自身也具有极大的自信。而那些依然从事传统渔业和农业的居民，因为生存空间日渐狭窄而其职业认同也日渐淡化。

不过，值得探讨的是，在本案例中，由于研究的对象——三亚回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的族群，其强烈的宗教意识始终在其族群认同变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如果撇除这一强烈的宗教因素，在一个宗教意识不强，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族群，其族群认同在受到旅游影响后，会如何变化？会否不同于三亚回族？是否会有新的表现方式？这些问题都值得通过在后续的研究中寻找新的案例地来进行解答。

参考文献：

- [1]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2] Van den Berghe P L, Keyes C F. Introduction: Tourism and re-created ethni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 11(3): 343~352.
- [3] MacCannell D. Reconstructed ethnicity: Touris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ird world communiti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 11(3): 375~391.
- [4] Hitchcock M. Tourism and ethnicity: Situation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1: 17~32.
- [5] Adams K M. Come to Tana Toraja. "Land of the Heavenly Kings": Travel agents as brokers in ethnic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 11(3): 469~485.
- [6] Esman M R. Tourism as ethnic preservation: The Cajuns of Louisian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 11(3): 451~467.
- [7] Pitchford S R. Ethnic tourism and nationalism in Wal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1): 35~52.
- [8] 刘晖. “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旅游学刊*, 2001, 16(5): 27~30.
- [9] 黄芳. 传统民居旅游开发中居民参与问题思考. *旅游学刊*, 2002, 17(5): 54~57.
- [10] 徐新建. 开发中国: “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以“穿青人”、“银水寨”和“藏羌村”为案例的评述.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21(7): 1~9.
- [11] 孙九霞. 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正效应.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7(4): 35~39.
- [12] 杨慧.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 *思想战线*, 2003, 29(1): 41~44.
- [13] 白杨. 旅游视野下的壮族族群认同. *百色学院学报*, 2006, 19(5): 23~25.
- [14] 马建钊. 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与社会变迁——对海南省三亚市羊栏镇两回族的村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察. *回族研究*, 2001, 44(4): 27~33.
- [15] 姜永兴. 广东海南回族研究. 广州: 广东省人民出版社, 1989.
- [16] 于光远. 三亚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发展战略研究.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 [17] 丁宏. 民族认同意识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 *宁夏社会科学*, 1995, (6): 92~98.
- [18] 徐红霞. 略论宗教的族群认同和族际排斥功能. *前沿*, 2005, (9): 242~244.
- [19] 孙九霞. 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以海南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 *民族研究*, 2004, (3): 61~67.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ethnic identity for destination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Hui Nationality

SUN Jiu-xia^{1,2}, CHEN Hao^{1,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ethnic issue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which was related to several conflic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tudy of ethnic identity is the basis and the difficulty of ethnic studies. As a kind way of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ethnic identity should be a great concern, especially on the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as a result of the booming of tourism. The current study of tourism impact on ethnic identity of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focused more on the destinations which take ethnic culture as its main tourism attractions, where the residents' ethnic identity might be misled by commercial advertising. So this study chooses the Hui minority community in Sanya of Hainan as a case destination, which is not taking ethnic culture as its main attraction.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ethnic identity before and after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cultural anthropology's research strategy and uses observations, interviews and documentation analyze as research methods and finds that the residents' main occupations related to tourism include tourism commodity selling, tourism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and tourism catering busines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does impact local residents' ethnic identity.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Firstly, religious awareness has been enhanced. Thanks to tourism participation, the Hui people have got much more earnings than before and could afford the expense of hajj and studying overseas in Islamic countries, thus, transit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mosque and folk residences from Chinese to Arabian, and enlarge the mosques to meet the needs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Secondly, traditional customs have changed. The status of working women has promoted due to the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business, and the marriage taboos got loosened. Along with the necess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igarette and alcohol taboos has also got loosened and the frequency of salat decreased.

Thirdly, the difference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caus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mployment, which makes the community identity not as united as before.

Key words: destination community; ethnic identity; Sanya; the Hui minority